

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1910年11月15日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耕读之家。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叶紫被迫流亡他乡。1933年,叶紫与陈企霞一道创办《无名文艺》月刊,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说,如《丰收》、《火》、《电网外》等,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星》及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9月回到益阳兰溪,积极准备创作反映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散文《鲁迅先生的回忆》等,可惜未能完稿。因身患肺病,无钱医治,贫病交加,于1939年10月5日病逝。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1908年8月9日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随周扬到上海投身革命,1934年从事左联的党团工作和报刊编辑工作。1937年9月抗战爆发,周立波到晋察冀根据地任战地记者兼翻译,创作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与《战地日记》。1944年参加长征,写下了报告文学《南下记》。1946年冬参加东北土改,后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解放后,周立波创作了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1954年回到家乡益阳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创作出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20多个短篇小说。1978年发表的《湘江一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1979年9月25日病逝。

周立波 叶紫



王竹良
周运来 / 著

研究



岳麓書社

YEZI ZHOU LIBO YANJIU

叶紫研究

周立波

王竹良
周运来／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紫周立波研究/王竹良,周运来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 - 7 - 80665 - 735 - 5

I. 叶... II. ①王... ②周... III. ①叶紫(1910 ~
1939)—人物研究—文集②周立波—人物研究—文集
③叶紫(1910 ~ 1939)—文学研究—文集④周立波
—文学研究—文集 IV. K825.6 - 53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098 号

叶紫周立波研究

作 者:王竹良 周运来

责任编辑:曾德明 郭 瑛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0.625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 - 7 - 80665 - 735 - 5/G · 651

定价:25.00 元

承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目 录

◆叶紫、周立波精神	001
-----------------	-----

◆叶紫研究

超越苦难——叶紫散文解读	009
叶紫与湖湘文化	017
叶紫与鲁迅	025
从叶紫小说《星》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034
叶紫笔下的女性世界	042

◆周立波研究

周立波与中国古典小说	050
周立波与外国文学	061
周立波的文艺观及其历史地位	073
周立波创作与延安文学	083
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简论	092
周立波报告文学中的战略视角	104
周立波报告文学中的宣传标语和民谣	113
周立波笔下的将军形象	122
周立波《万里征尘》的史诗美	133
周立波故乡小说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	143

周立波故乡小说创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55
周立波故乡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新风赞歌	167
周立波作品中的新农村干部形象	179
社会主义农村干部的成长历程	191
周立波小说与湖湘文化(一)	202
周立波小说与湖湘文化(二)	211
周立波创作中的和谐美	223
周立波小说中的益阳风情	232
周立波创作的民族风格	244
周立波小说的平民意识	255
周立波小说中的益阳方言	267
周立波故乡小说中的益阳风土人情描写摘录	282
浅谈周立波散文的创作特色	297
周立波的诗歌创作	305
 ◆叶紫、周立波大事年鉴	
叶紫大事年鉴	312
周立波大事年鉴	318
 ◆后记	
	337

叶紫、周立波精神

——《叶紫、周立波研究》自序

叶紫、周立波这两位同时代的益阳文化名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人格却因为他们伟大的创作而永生。他们身后的每一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会为他们虚席以待。读过他们作品的人们总是会掩卷深思同样一个问题:是什么精神支撑了这两位伟大的战士,使他们有如此不朽的成就?

纵观他们的一生,细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发现他们有如下共性。

一、艰苦奋斗的精神

叶紫出生于1910年11月15日,1922—1925年就读于岳云中学,学生时代就结识了大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16岁就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7月下旬,叶紫一家人参加大革命惨遭镇压,死的死,逃的逃,他身负血海深仇到处流亡,求仙练武、当兵做苦力。1930年他来到上海,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创办刊物,加入左联,投身写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他羸弱的肩膀既要挑起沉重的家庭负担,又要作为革命者担起揭露不平人世的社会责任。长期的穷困潦倒和高强度的精神苦痛以及他对写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彻底地透支、击垮了叶紫的健康。他正在创作的中篇小说《菱》、

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散文《鲁迅先生的回忆》都因此未及完成,成为永远的憾事。他为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才奋斗了四年。但是这四年中,他创作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散文、短评、杂感等,他的作品给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横空出世般的冲击,他用大众的技巧写大众的生活和大众的情绪,用自己的笔和笔下的角色来抒发自己对吃人的世界的不满和愤恨,用满腔的热情歌颂觉醒者的反抗。上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的写作者大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缺乏真正的了解,作品中底层劳苦大众的形象往往苍白无力;固然也有佳作,但笔墨多停留在表现人物苦难的层面,缺乏催人奋进的反抗斗争的描写和刻画。而叶紫的人物几乎最终都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这与他独特的经历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贫病交加,一方面是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他用他的作品“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周立波出生于1908年8月9日,和叶紫从少年时代就是朋友,左联时期,两人交往甚密。1928年周立波随周扬来到上海,刻苦自学英语,1931年开始翻译作品,先后翻译了《杜布罗夫斯基》、《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等日后对他的创作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同时他阅读了大量欧美、苏俄名著和马列文论,创作了至今都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文艺理论论文。他与周扬一起发起了创作国防文学的倡导并成为国防文学创作的先锋。他亲临前线,饱蘸血与汗,写下大量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兼备的报告文学,开创了报告文学写作在中国的先河。延安时期,他的世界名著选读课因为其知识渊博、生动有趣的讲解吸引了外系的学员甚至“鲁艺”以外的人士,他的课堂由教室开到了大操场,成为一段佳话。从1948年开始,他不断地深入农村、工厂,写作了《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以及系列家乡短篇小说,两度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同时完成了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和国内繁重的社会工作,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茶子花”文学流派,培养了一大批独步中

国文坛的文学湘军。老实说,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其中一项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他的一生都是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拼杀过来的:国民党的监狱、九死一生的抗日前线、复杂的土改斗争、艰苦的工厂农村生活、四人帮的冤狱。所幸的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一个钢铁般的文艺战士的良知,他始终如一地用自己的笔呼唤着正义与真理、善良与美好、和平与自由,并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叶紫和周立波都是在用心血和生命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事业和革命事业,他们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是他们成功的基石。

二、创新精神

前面讲到叶紫的文学创作给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是因为他作品的内容比一般的作品能更真实地反映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二是因为他表现了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后者给读者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和曙光,也是对当时文学创作的一个创新。叶紫还以自己独特的旧军队的生活为题材,写作了不少反映国民党军队荒唐腐败的文章,揭露了军队内部的重重矛盾,反映了底层士兵的不满情绪、造反苗头和斗争。这类作品拓展了当时的创作题材,丰富了创作内容。他的《星》打破了当时“恋爱加革命”的时尚,深入探讨了女性的出路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使作品有了极深的历史厚重感。他的创作既继承了鲁迅的优良传统,又有题材和内容的开拓和创新。

周立波一开始就主张文学应该写真实、写今天、写大众,讲究文学创作应该与时俱进。他提倡的文学大众化的思想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十多年。他提倡国防文学,最早介绍引进了基希的报告文学,为抗战宣传找到了一种更便捷的表现方式。他的小说创作既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独创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乡土风格,超越政治局限,

反映真实的民间声音。他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他对新人的培养方面,他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地传帮带,延安时期、解放后,都花费了不少心血,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了过硬的生力军。

创新精神是叶紫、周立波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也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关键。

三、献身精神

1939年6月24日日记中,叶紫写道:“我关心着世界大局,耽心着祖国的存亡,关心着全中国的文化事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的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责任……假如这是我的致死的原因,那我真是死而无怨。”这个时候,他“身体已如纸扎人,仅仅几根骨头了”,却依然无怨无悔地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他的精神直到现在仍然激励着无数的人们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努力奋斗。他的这种献身精神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他少年时代求学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亲人、朋友流血牺牲对他的激励,左联时期自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经历了不知多少斗争的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时刻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勒逼’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然而,我这支拙笔啊!我能为他们写下些什么呢?”他正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斗争的需要,而积极地献身革命文学创作。

周立波革命的一生可谓九死一生。他的报告文学中多次写到他遭遇到的死亡威胁,但每次他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尤其是《徒涉》中写到:“天上盖满云,四野漆黑,山和群树只是一些凝结的比夜空还要暗些的黑影。我们用心睁大眼睛看,也只能模糊地辨清三尺以内的道路。冷。今年的冬天是河南最冷的多雪的冬天,今夜的天气是冬天最冷的酿雪的天气。呼啸的寒风是透人骨髓的奇冷。带着手套也不能使手温暖起来,我把棉衣前的钮扣解开了

一个,把手伸进胸口和两腋,凭借体温,使手不至冻僵。”离他们不到三里路就有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离他们最近的敌人碉堡只有一二里路,后卫部队却已经与敌人交上了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必须徒步裸体渡河,“河的中流,水齐肚脐,冰块从肚皮上擦过”。不必说过河时随时会遭遇敌人的子弹,也不必说战士们因御寒衣物不足,手脚冻裂了很多殷红的口子,下到水里会是怎样的痛苦难熬,光是在那么奇寒的冬夜裸身过河,就已经是我们常人难以超越的极限了。但当他们渡过河生起篝火,稍稍温暖一点,就又像黎明一样清新明快、生气蓬勃了。战士们面对死亡、面对艰难困苦所流露出来的豁达和洒脱是那个伟大的时代里中华民族最令人崇敬的要素。所以,周立波的献身精神正是无数为革命的成功无私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革命战士的献身精神的缩影和延伸,周立波接过了这些火炬手传递过来的火炬,继续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献身者未竟的事业。

英勇的献身精神是叶紫、周立波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团队合作精神

大革命失败时,叶紫得以逃出曹明阵的魔爪,得益于叶紫岳父一家和益阳当时虽然被破坏但还顽强活动的大革命的积极分子的帮助。这是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他的一生中还有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卜息园,他把叶紫带到革命的道路上,领着他参加革命活动,介绍他参加共产党,并拼尽最后的力量通知他转移。叶紫的生命中,甚至他去世后,一直有很多给予了他无私的精神鼓励和经济援助的良师益友。团队合作精神的又一次地赋予他生命的活力与意义。他与陈企霞、钟望阳、聂绀弩、张天翼、鲁迅、邝达芳、许久龄等人的默契合作使他短暂的生命充实而有所作为;在上海,他居住的破旧的亭子间经常聚集进步作家商讨各种事宜。在他贫困潦倒之际,又有很多熟识的朋友

和从未谋面的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又是一种团队合作精神的体现。

周立波一直生活在一个和谐的战斗的团队中。他向周扬学习外语,两人合作翻译作品,一起提出国防文学的主张,共同驳斥论敌;抗战时期的行军路上与将士们一起克服一道道难关,同生死,共患难;与农民一起分享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过程中所有的喜怒哀乐;与青年们切磋文学;难友之间互相鼓励等等,都使得他的人生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也更加快乐。

团队合作精神是叶紫、周立波事业成功的必要的外部条件,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默契的团队精神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五、淡泊名利的精神

叶紫因为创作《丰收》而一夜成名,但他并没有陶醉,他对自己的要求从来没有停止过,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不平凡的经历已经使他不断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慢慢地变得豁达、洒脱,淡泊名利。为了养家,他应该拼命写作才是,而且他的约稿很多,已不必为无处发表而发愁了;但是,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不能胡编乱造,不能“写应时、应景,指定题材和规定长短的痛苦的东西”,“宁肯‘饿肚皮’都做得”,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在那种特殊处境下的叶紫身上表现得是多么可贵啊。

周立波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因为陪同史默特莱和卡尔逊访问抗日前线和抗日根据地,而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高层领袖人物。他与王震、王守道、王恩茂等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他与周扬更是志同道合,以他的贡献,他完全可以在北京过舒适、优雅、高贵的生活,但他常年举家生活在基层,和农民“三同一片”,把自己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的奖金主动捐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多次把自己的稿费捐给故乡建果园、修茶场、办公益、帮助贫

困的农民等,他没有高官贵族、文人雅士的架子,平易近人,海人不倦。

叶紫、周立波的精神实际上是湖湘精神的具体写照。他们从小生活在崇尚湖湘文化的湘中益阳,又在湖湘文化的中心长沙度过自己的中学时代,在那里接触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经受了各种磨砺,百炼成钢,最终修炼出令人敬重的学养和精神,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自己也因此而永生。

编 者

2007年7月28日于益阳

超越苦难——叶紫散文解读

叶紫短暂的一生饱受人世的苦难,他以自己的传奇经历为题材,创作了饱含血与火的战斗檄文,超越小我的苦难,探寻大我的生存出路,为我们留下了超越时空的不朽之作。

叶紫散文和他的小说都取材于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传奇的经历,他小说中的故事题材和散文中的取材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能从他的散文中看到他小说中的不少原型。众所周知,散文更便于作者感情的抒发,更便于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和了解。他在《〈星〉后记》中一开篇就写道:“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说。”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合卷深思,他短暂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超越苦难。

一、超越小我的苦难,寻求大我的出路

1. 超越个人的血海深仇

叶紫于1910年11月15日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耕读之家,父亲教过私塾,做过生意,当过县长和团防局局长。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求学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

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大革命在湖南蓬勃发展之际,叶紫一家人在其四叔——共产党员、益阳县农民协会会长余璜的带动下,都投入了农民运动。父亲余达才担任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大姐余裕春担任兰溪女子联合会会长,二姐余也民任兰溪团委书记,二姐夫也是他的同窗好友孙见仁加入了共产党,16岁的叶紫也投笔从戎,进入中央军校武汉军校第三分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长沙马日事变,叶紫的父亲余达才和二姐余也民惨遭砍头;母亲刘氏在陪刑场时,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经常歇斯底里或痴痴呆呆;四叔余璜、四婶郭亮继续在洪湖赤卫队战斗,后来双双壮烈牺牲。叶紫回乡也遭追捕,被迫流亡他乡,要饭、当兵、做苦力,尝遍人间苦难。他幻想成仙得道,白光一道,报得血仇;在国民党军队里吃尽苦头,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吃苦能换来兵权,回乡报仇。1930年,他漂泊到了上海,并在同乡志士的指引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33年春,叶紫与陈企霞一道创办《无名文艺》月刊;同年6月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以自己的身世经历、家乡农民运动为题材,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如《丰收》、《火》、《电网外》等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在上海四年,叶紫先后发表七十多万字的小说散文。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因为身体原因他无法参加在上海的抗日斗争,回到了长沙,一边治病,一边与友人创办《大众报》,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9月回到益阳兰溪,靠朋友们的接济艰苦度日,但他仍然继续关心着大局,时刻不忘自己作为文化人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积极准备创作反映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散文《鲁迅先生的回忆》等,可惜未及完稿,便因身患肺病,无钱医治,贫病交加,于1939年10月5日病逝。叶紫作品多取材于湖南农村生活,常以曲折的情节、生动的笔触,反映大革命前后洞庭湖畔工农群众的苦难与抗争,着重描写了贫苦农民的悲惨状况和斗争精神。叶紫当年曾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我经历了不知多少斗争的

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时刻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勒逼’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然而，我这支拙笔啊！我能为他们写下些什么呢？”他正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斗争的需要，而积极地从事革命文学创作。

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逃亡出来的叶紫最初的最大愿望就是报仇。但是，两年的流亡生活，尤其是上海左联时期，他看到的是饿殍处处、哀鸿遍野。由此懂得了个人苦难与民族苦难息息相关，不推翻旧制度、旧秩序，民族的苦难就没有尽头，人民的命运就永远是悲惨无边。我们看叶紫的作品便能感觉到，每篇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血和泪，仇和恨，始终处于激烈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充满炽热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鲁迅先生说得好，这样的“文学是战斗的”。当听到仇人曹明阵的死讯时，他格外镇定，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即使他是我的杀父之仇，只要他是在前线杀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受了苦难，只要我的力量能够救他，我一定会去救他的。”此时此刻，他的个人私仇已经被国家的生死存亡大计所取代，他个人的小我的苦难已经被人民群众的苦难所取代，他完全走出了个人私仇的阴影。他的作品中复仇的主题很鲜明，赵得胜、云普叔、刘翁妈、王伯伯等，都由于自己的私仇而走上了更为广阔的解放民众的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2. 超越贫苦与疾病

叶紫的散文题材丰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事、抒情、写景的，这是狭义的散文；一类是评论、序跋、纪念、悼亡、日记之类，这是广义的散文。狭义的散文又分为两类，一是反映自己家庭和人民疾苦的，一是反映国民党军队腐败的。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内严惩，对外妥协，天灾人祸，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农村破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叶紫留下的散文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并剖析了其成因；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和官兵矛盾的激烈、军民冲突的尖锐。与同时期一

般的散文不同的是,作者的笔墨并不只是停留在描写现象、揭露社会病因的层面,还注重描写农民特别是保守的老式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摆出苦难的现状,揭露矛盾的本质,展示希望的未来,是叶紫散文集中反映的焦点。

叶紫反映自己家庭生活苦难和亲人不幸遭遇的散文总是放在民生问题的背景下来展示的。《好消息》中,作者为了对母亲隐瞒真相,强装欢笑;《殇儿记》里,儿子维太传染了灾后疟疾,母亲、妻子抱病在身,他痛苦、自责、无奈,瞒着家人,独自四处筹钱,仍然挽救不了儿子,妻子绝望地控诉:“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苦难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故乡!”《夜雨飘流的回忆》里,在长沙天心阁的小客栈里,他的父亲和二姐死难百日的那天,这个不满17岁的少年,想起惨死的亲人,想起自己渺茫的前途,想起可怜的母亲和逃难在外、生死不明的亲人,彻夜难眠,四周所有的声音——吆喝买卖的声音、隔壁驱赶牲畜的声音听上去都是那么凄苦,如同绝望的哀号;《南行杂记》是记录自己和良师益友卜息园的一次郊游,既写了熊飞岭的险峻壮美,更写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状;即使令人神往的浯溪石碑和洞庭风光,作者在描写它们时重心还是写民生的艰难。作者记录自己军旅生涯的一组散文,用亲身经历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矛盾尖锐复杂。因为揭露深刻,《行军掉队记》、《行军散记》在1934年11月1日《小说》第11期已经排好版的情况下,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抽去,只在目录里留下篇名。但是他的笔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妥协过。

1939年叶紫留给世人一份解读研究他的创作、生活和思想的绝笔:1939年写下的《病中日记》。《病中日记》记录了叶紫一家回到兰溪,先是投靠亲戚,后来租住在河边渡口一个又小又破的茅草房里,生活更加凄惨,贫病交加,到了靠借高利贷过日子的程度。但是他的生活态度却越来越达观、幽默,甚至开始研习古医术和古诗词。看看他自己写的门联就略知一二了: